

洪水之后

〔捷克〕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EVA KANTURKOVA

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洪水之后

〔捷克〕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徐伟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va Kantůrková

Po potopě

Praha; nakladatelství Hynek, s.r.o.,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水之后/(捷克)康图尔科娃 著;徐伟珠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483-0

I. 洪… II. ①康…②徐… III. 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919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洪水之后

Hong Shui Zhi Hou

[捷克]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徐伟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06483-0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中国读者

优秀的作品无需任何的解释,小说本身赋予人们情感和理智。虽如此,每当我拿起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我会去寻找相关的历史时期的信息,为了把故事的情节置身其中,因为,并不尽然,欧洲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认为,关于这本小说有必要说明几句。

《洪水之后》我写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对五十年代的强权恐怖,无中生有的政治案,司法命案等有了一些清算。类似题材的佳作在六十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我选择的主题较为私密,一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她深深凸显了恐怖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的氛围特征,让我们联想到,在那样的年代里,杀戮和摧残不仅仅发生在监狱,艺术才华的被威胁和剥夺同样等于死亡。

小说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几篇书评里多数已是拒绝的声音,因为捷克国家已经被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小说除售出的一部分,其余全部送进了碎纸器,并被列入图书馆的禁书名单。我的其他小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特别是拍摄于一九六八年的电影《悲哀的庆典》,根据我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一个村民在强行合作化过程中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家园的故事。电影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禁上演,在国际电影节上荣膺了好几个奖项。

I

最好笑的是，往家走的一路上，直到回到了家里，我还在不停地观察：我恍若影子一般走在自己的身旁，看自己在做什么。这真是个好办法：一个人一旦感觉自己不大对劲，马上要做出格的事情的时候，便立刻又把自己合二为一，叮嘱自己：“够了！照医生吩咐的去做吧！”在这之前，医院已经两次在星期六的中午把我放回家。我是个轻症病人，准许我外出也属于治疗的一部分。平时看守严密的大门此时向我敞开了，他们说：“您可以走了，到熄灯时分再回来吧。”然而以前都有洪琪克^①来陪伴我。每一次她朝我们病房所在的三层楼那扇毛玻璃门迎面走来时，我已端坐在里侧的走廊上等她了，看着那一团模糊的红色影子从楼梯上来，慢慢地挪近，那是洪琪克的夹克短衫，门上的铁栅栏把衣裳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状。在伸手按门铃之前，她总是先把短夹克利索地脱下来。未等铃声响起来，我会冲护士喊道：“护士小姐，快给我开门，家里有人接我来了，”随后我们俩便离开医院，先去甜品店。在那里毫无例外，我们都把身上所有的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洪琪克让我把一部分奶油蛋糕夹到小盘里，剩下的部分让售货员包起来。那时候奶油还是稀罕物，价格不菲，但是她从不吝惜，每逢星期三来

^① 主人公“我”的女儿杨娜，洪琪克是其别称。

医院探视的时候也捎上一小盒。鲜奶油搅拌得甜甜的，正好补充我胰岛素休克治疗后体内匮乏的糖分。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我欣喜而平静地疾步穿过医院的花园，洋洋自得，甚至没有再回头看一眼身后我们科的窗户，我像新兵似的昂首穿过前侧楼的底廊。然而我一踏上那两级通向马路的低矮台阶时，一种忧郁和胆怯刹那间涌了上来，所有的激动霎时烟消云散。我企盼着，在某个地方也许洪琪克在等着我，然而眼前空无一人：大概他们严厉叮咛过她了，即便远远在后边跟随我，那也不允许。

“西尔薇女士，”教授先生对我说，他是附属医院的院长，“您今天回家可以去浇浇花儿。明天回来，在这里再呆上一个星期。”就是这位教授先生，当我的好朋友米兰给他打电话，请求他接收我时，他曾这样发问：“噢，亲爱的同事，您说的这位病人狂躁吗？对周围的人有没有威胁？”

“没那么严重，教授先生。”

“那您为何再三要求我立刻接收她呢？您不是不清楚，有多少病人正等着我们的诊所腾出空床位来呢？一个床位同时有两个病人在等候。我们只接收紧急病例。”

“教授先生，她是个艺术家，对于这类人……”

“唱歌的？”教授疑虑重重地询问。

“不，她是位画家。”

“那就另当别论了。把她带来吧。”显而易见，我已完全博得了教授的好感，两个月治疗下来，他还挽留我再呆一个星期。

“我们对您只需要观察治疗了，”他说，“就是那种过渡期的观察。”

“这意味着，我彻底健康了？”

“您怎么老是问这惟一的问题啊，”他不满意地回应我，“我亲

爱的女士，我们当中有谁是完全健康的呢！”这位教授先生是个大好人。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缓慢地打着手势，可能怕吓着自己的病人吧。他的手指头被尼古丁熏得蜡黄，细长而冰凉，当它们触碰到我的额头时，倒是挺舒服的。医院里确实已经人满为患，病情较重的患者他们一概不收了，这些可怜的人径直被送往精神病院。毕竟他还存有一丝恻隐之心，那些被他留下来的重病号，暂时被安置到了一层的走廊上。护士们的值夜房间也被腾了出来，把她们的小桌和台灯挪到厨房里去了。“每一次时代的跌宕都会产生对精神病学的严重冲击，”教授先生常这样说，我将这句话看作一种笑谈：这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宗教学说以及其他的什么学说，居然还存在心理医生的学说。反正那时我的切身感受是：只有世界正常的时候，生活其中的人们才会正常。可是世界充满了残酷和疯狂……只是我现在所说的这些，太过平庸了，我想说的是：假如因为这段动荡时期导致医院里的病人激增，但教授先生仍然邀请我再进行一个星期的治疗，那么我打听自己是否康复，这个问题纯属多余，而且不合时宜：因为假如我已经健康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治愈了我的病，那他们就用不着跟我这样拐弯抹角了。

我来到了街上，暗中四下打量，看洪琪克是否远远地尾随在我身后，她的红色短夹克从老远我就能一眼瞥见……同时我也观察自己，我沿着夹在高楼和寂静的医院正门围墙之间的蜿蜒小道快步走着。令我满意的是，没有遇见什么人，甚至在整条街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陌生人的脸。渐渐我又忐忑不安起来，等我独自走到那第一条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上时，自己该怎么办？心里一点儿没谱。

我跟洪琪克一起坐过两次有轨电车，和她在一起我是不惧怕别人的。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洪琪克使劲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监护人似的领着我。我不错眼珠地打量着她，因而就顾不上注

意自己了。但我一个人这么走着的时候,我的脚步声恐怖地回响在空寂的街道上,两旁楼房的窗户闭得严严实实,但是它们随时都可能突然打开,许多陌生的人和陌生的脸,从窗子里探出来,看看究竟是哪个肇事者,沉重的脚后跟敲破了他们小街的宁静……我越来越接近喧嚣的马路了,耳边已传来陈旧的有轨电车行驶时发出的轰鸣和呻吟。我责怪自己,当初没有请求医院的门房用电话替我约一辆出租车。在卡特琳娜大街的拐角处,我遇见了第一拨人,三个从乡下来的人,两个老妇和一个男人,打远处从他们的衣着和蹒跚的步子就不难判断出他们来自农村。显然周末他们去某一家医院探访熟人去了。我走到了马路的另一边,这样和他们擦肩而过时不至于靠得太近。尽管如此,从他们身边交错而过的瞬间,有一种迫切的欲望袭来:我必须立即返回医院,不然要出事儿了。我必须回到我们科的玻璃门前,敲响门铃说:“我不想……我无法走到……我不管我的花了,随它们枯萎去吧,”我将重新藏匿到铁栅栏后面的隔离室里……同时我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脚跟继续囊囊地砸着地面,往下飞奔到了日特纳大街。

走到我和洪琪克每次必去的那家甜品店门前,我决定买一些奶油卷。自己一个也不吃,我拿定主意,所有的都打包带走。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包裹,奶油卷加上鲜奶油,我全部带回家中,这样我就有东西去招待客人了。他们不会无端不来的,我给自己壮胆,既然我已经两次被尝试着放回家,这消息一定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谁不想来看看啊,最起码出于好奇心吧。出于友情也会有人来的,我安慰自己。此刻有一点我没有把握,各类的朋友和熟人会如何看待我;有一点我又可以放心,那就是洪琪克绝不会撒手不管,她肯定会邀请一些人上门。我没有规定该邀请谁,不邀请谁。哪些人可以来,我都让洪琪克自己做主了,我把他们一律统称为“客人”,给客人准备的奶油卷。在客人面前,如果我连奶油卷都拿不

出来，那不像样子……于是我迈进了甜品店。有轨电车最终我还是没有上，我感觉车厢里太拥挤了，玻璃窗后面那些人的脸孔显得那么丑陋和冷漠，我转身迈开步子往家走去，我把装有奶油卷的纸盒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俨然像一面防护盾牌。

我不像一般的精神病患者那样害怕见人，我也不疑心有人想伤害我。我担心的是，当别人与我四目相对时，对方会一眼看出我得的是什么病。呆在医院的诊所里我是安全的，那里只有两类人跟我朝夕相处，其中的任何一类对我都不会造成威胁：一类是与我同一病房和同一科室的女病友，她们跟我一样精神失常。因为自己属于可以被治愈的病例，在这一点上我比大多数不可救药的精神病人要好得多了，那些人迷失在自己的噩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医生和护士构成第二类人，他们不仅了解我的一切，对我还负有一份责任：那就是祛除我的噩梦。但是对于传达室里的那个男人，我就没有勇气请他帮我打电话约一辆出租车，对我而言他已经是陌生人了，我害怕他的眼神。

“什么样的眼神？”几天以前洪琪克曾问过我。

“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嘲笑的眼神吧。”

“为什么是嘲笑的呢？”

“人们嘲笑疯子呗。”

“哪些人？”

“就是普通人，所有的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我小的时候，跟老妈一起住的那个村子里就有一个疯子。所有人都拿他开玩笑，包括我。”

“他肯定是疯子吗？”

“怎么叫肯定？”

“嗯，比如说现在你如何肯定，他确实是疯子呢？”

“大家都这么说他的。”

“也许他不是疯子呢。”

“他的行为跟疯子一样。”

“那时你还小，大家笑话他也许是因为别的事情。”

每当我说出心中的某些担忧时，洪琪克，我的女儿，总是把她的逻辑安插到我的想法上，然后像一只巡回犬那样走啊走，直到向我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是虚空的。我很欣赏她这一点，她没有向我证明我没有疯，我只是病了。对于我的失常，就像当时对待所有发生的事情一样，她冷静而理智地接受了，现实与情感没有混为一谈。她的表情总流露出，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病会是一件遭人鄙视的事情。然而她的单纯、率直并不能带我走出迷惘，当我在她的逻辑驱使下最终无言以对，沉默不语时，她如释重负的模样让我感动，她只是阻止了我一次次想坦诚表白自己的企图。我那时尚未成年的女儿，老练而果断的女儿，终究还无法达到权衡事物双重性的境界，她确实以为，事情只要说出来，就迎刃而解了。而那时我是多么需要与人倾诉啊！这必定是滑稽可笑的，在我和我的女儿之间没能展开的话题仿佛就是为了留给 L 来完成的：我亲爱的、惟一的 L，他肯定有足够的耐心来聆听我的倾诉，或许还能给我建议。他肯定能做到。

那次与米兰的谈话结果，令我记忆深刻，当时感觉好像比我与 L 的最后一次谈话更具有毁灭力度，在这一点上洪琪克不具有分辨力：关于 L，她随时随地都愿意谈起（可能是我的医生们对她这样建议的，所谓的宣泄疗法），但那时的她并不完全明白，需要宣泄的是我的恐惧，那些直接威胁我的东西。对 L 的回忆那时离我太遥远了，我只能慢慢地重拾那些回忆。但是当我把我与 L 最后的一次谈话跟我和米兰的交谈进行比较时……与 L 的谈话凝聚着高贵和优雅：两个人，两个有理智的成年人，他们发现，尽管彼此相

爱,然而用对于他们俩以及其他相关的人都皆大欢喜的方式,是无法处理好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的,所以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吞咽下所有的狂热和痛苦,潇洒而优雅地分道扬镳了……而与米兰意外的会面简直糟糕至极。聊天的时间很短,米兰甚至连咖啡都没有喝完,而我从谈话中得出的结论是骇人的:背叛的威力无穷之大,不仅是人对人的背叛,更是我们对自己的背叛。“米兰,你在这里跟我说的话,你确定吗?”我们坐在我公寓松软的低矮沙发里,沙发正对着巨大的窗户,来的所有客人我都安排坐到这里,这样他们可以欣赏到佩特欣山、斯特拉霍夫电视塔和布拉格城堡区的景观,欣赏之余他们常常惊羨不已。米兰的说话方式很急切,富有启发性,又蕴含些许神父般的温和,他跟我说话时就这个样子,大概所有的心理医生都习惯以这种腔调和自己的病人谈话吧。“西尔薇,你必须相信我。不然你就不好了。你不能怀疑医生想伤害你,否则治疗就没有效果。”他并没有急于要我回答,而是巧妙地问了一些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问起了窗帘后的雅古柏,问起了炉灶为什么调试不好,问起了无花果叶上的洞眼、枯萎了的杜鹃花、落满尘埃的阳台上男人的脚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我说不清楚的东西。诚然,我感觉震惊,但我没有自以为是。我相信米兰,洪琪克选他来做我的心理医生是正确的。

我和米兰在二战前就相识了,那时他年纪轻轻的,瘦高俊朗,留着中分头,出生在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里。对于每一位这样中规中矩又决意加入我们艺术家队伍里的人,我们都拍手欢迎,又不忘拿他开涮一下。米兰读大学的时候就迷恋上了精神病学,很入门。他常给我们朗读弗洛伊德的文章,给我们很多建议。“朋友们,”我的同伙威廉不止一次这样说,“正视这个职业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不定哪一天会用得上米兰,将来谁精神出了毛病,保不准米兰会是我们的医生呢……”我在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洪

琪克一打电话,他就急忙赶来了。

(从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推测出人寿命的长短,时间是变幻莫测的,关键已经有许多例证,证明时间的变化莫测。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我不能说,短暂的一生就不能活出精彩。我来叙述一个星期六下午在米兰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记忆会跳跃,会幻化,就像一堵移动的镜面墙。但是我从中看到的米兰,永远是那副面孔和那个样子,有别于其他人。他们把他监禁了起来。不是德国人,二战时的沦陷期他反倒幸运地活下来了,关押他的是我们的人。我们私下曾悄悄谈论,当深夜里他们前来逮捕他时,这个被摘走了眼镜什么也做不成的近视眼,曾大声呼救。“救命!救救我!”我在想象中看见山坡上那个夜幕笼罩下万籁俱寂的葡萄园街,那条两旁坐落着成片的别墅和绿茵浓深的花园的街道。我看见他了,有人正把他往汽车里拖,他叫喊着,大声呼救!那个时期没有惯例以叫喊来拒捕的,据说就连那些无辜被枪决的人也不叫嚷。后来,他被放回来之后,我问过他:“你以为有人会听到你的喊声吗?”——“毕竟有好人吧。”——“那有人回应你了吗?”——“没有,”他说,在深度镜片后面的眼睛睁得很大。“也许那些好人恰巧睡得正沉。”)

当洪琪克走进来时,我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内心平静了下来。“洪琪克,”我迎上前去,“你没想到吧,我是个疯子。”我将此话尽量像说笑话一样说出来。

“我都知道,西尔薇,”她一边跟我说着话,一边站到我的身旁。现在我身边有两个人,一边是我女儿,另一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们心里都明镜似的,再过一会儿我就要被送到心理诊所去了,只是我还蒙在鼓里而已,他们惟一发怵的是,我是否会自觉自愿地跟他们走,因为他们知道,暴力对疯子是无效的……现在我真切地感

觉到,死亡是多么的诱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活里的一个片断,那段与L共度的时光,按照我不甚了解的森严的法规,它们像一座座无法逾越的城池,在我面前突兀地浮现,最后以死亡告终,那是我的死亡。而眼前这两个人,米兰和洪琪克,没完没了地向我保证,教授先生可以治愈我的病。随它去吧,反正一切已无法挽回。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着了魔似的沉湎于对同室女病友们的观察之中。我试图寻找出自己与她们相似的地方,死亡是怎样姗姗而来的。由于我是个轻症患者,更隶属于这个医院里的另一半群体,与医生和护士是同一类人。很快我了解到,为什么这些女人会这么执迷不悟,她们在疯狂的道路迷失得有多么深。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是一个轻症病例:大多数那些不幸的人儿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她们徘徊在兽性的边缘。而在我身上尚存一丝人性的东西,我还有意识,他们往我体内注射胰岛素,让我沉沉昏睡过去,把我大脑中的记忆抹掉……

“那你们到底想要抹去什么呢,教授先生?”所有的人对我的问题都答非所问,就像童话《玛什卡和耶尼切克》里的那个农妇:

“嗨,您有没有看见两个孩子跑过去了?”

“噢,我在撒甜菜籽呢。”

“我是问您,有没有看见孩子,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等我播完了种子,种子就会发芽……”

不,涉及最本质的东西,关于洪水,关于我的死亡,他们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将我带到云山雾海之中。教授先生给我解释,像我这种情况为什么使用胰岛素休克更适宜,而洪琪克则建议我,让我把盲肠手术后留下的疤痕给他们看看,告诉他们,这伤口刚愈合不久呢。“如果你不愿意去心理诊所,你就对他们说,你正在外科疗伤呢。”每个人都这样表现,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在旁枝末节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要从最根本的困扰中解脱出来还得靠我自

己……但他们不能让我心存虚无的希冀。他们真了不得,只有我一个人始终不得而知,更主要的考验在前面等着我呢。

就像抱着盾牌似的,我抱着奶油卷一边走,一边考虑面临的处境:街上的人流从我身边趟过,越来越多。上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布拉格街道上还没这么多的人,像今天这个样子,然而只存在千分之一的可能性,恰巧就在布拉格的这一角,某一个相识的熟人会遇见我。那些陌生的路人对我视而不见,只有一位先生急步跑起来追赶有轨电车,差点把我撞倒,幸亏他及时看到了我的奶油卷,刹住了步子。“哦,对不起,”他摘下了礼帽,突然不急着去赶电车了,“请您责骂我吧,为了赶电车我差点儿撞倒了一位美丽的太太。”我抬起头,绽放出自己最明媚的微笑,我什么都没有说,可是心情一下子晴朗了起来。我干脆走到下面的查理广场上,在冰凉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把裹着奶油卷的包装纸微微揭开了一条缝隙,空气里荡漾着春天的气息,明丽,清新,阳光灿烂,一群群麻雀喳喳叫着,山鸟不知疲倦地啾鸣。长椅的位置有些偏僻,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奶油卷散落开来了,在这一刻我几乎是幸福的。我坐着等到了两点钟,此时我们大楼里的两个看门人都从楼门口走出来了,男的去啤酒馆,女的去墓地。这下我的回家之路进展得很顺利,没有阻碍,也没有证人。

“你知道上帝为什么惩罚你吗？”老妈就这样发问，等她总算获准来探视我的时候。她僵直地坐在医院的白色长椅上，身姿显得很吃力。长长的走廊上就我们两个人，天花板很高，甭指望从那些紧闭的房门里走出哪怕一个人影儿来，因为老妈是在规定的探视时间外来的，医生们正忙着门诊，护士们则在病房里查房。虽如此，老妈的脸上时刻准备好表情，万一出现一个人来呢，就能见证我们这次家人的团聚。老妈喜欢身边有围观者，不让她高谈阔论，发表自己的见解，那她情愿闭口不言语，她用这种方式来威慑自己的亲人：在旁人的注视和倾听下聊我们最隐私的事情。“姥姥是一个虐待狂，”洪琪克不止一次这样断言，“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也得听任她摆布。”在对抗老妈的问题上，洪琪克从来表现得比我勇敢，孩童时期她就拒绝与老妈一起上街，就为了躲避她在公共场合的无所顾忌。老妈从不在家里惩办我们，她随时随地即兴发挥：在学校里，在公园里，在其他孩子跟前，在无论男女的成人之间。她曾表演了那么多出闹剧，在邻居们的面前，在有轨电车里，在大街上，在餐厅里。可怜的老妈，她对此坚信不疑，如果对孩子不加责罚的话，将来他们就会恩将仇报！她对我们从来不讲究轻声慢语的劝诫，有策略地维护我们的面子和自尊……洪琪克不像我，对她从不买账，一开始就执拗地抗争（讲一个笑话：在杨娜十一岁那

年,老妈在她的鞋底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脏纸片,天真的小女孩在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查理·赫格是我惟一的爱。老妈根本不问谁是查理·赫格,举起炒勺在大楼前追着外孙女就要揍,嘴里还大声嚷道:“我让你爱……这还了得?你才十一岁,到了二十岁你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谁都会指着你说:小伙子们,快看,杨娜来啦!”)。可是,让我彻底摆脱她,我做不到:老妈总得有一个牺牲品,那就让我来充当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吧。

老妈与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月,让她发现了奇妙的表演舞台:她的脸上有许多皱褶,内心的情绪波动能即刻闪电般在她脸上展露:从同情时的双唇紧闭,到受辱时的阴沉;从气愤时的耸鼻锁眉,到谄媚时的讪笑,这张脸太神奇了,时刻处在备战状态,丝毫不会懈怠。这张造型别致的脸,可以描摹出生动的肖像来,只是我至今没有斗胆为老妈圆这个梦,她自己从不提起也不给我暗示。老妈不仅自负,她首先会把这件事看成一种侮辱,因为她始终表示,不管过去和将来,她对我们不图任何回报。然而我清楚,她心里想的恰恰相反,她太在乎那幅肖像了。那该是莫大的荣耀,把自己的画像挂在家里最显赫的位置,把客人们带到画像前说:“那就是我。西尔薇画的,很有神韵,是吧?有这么懂事的孩子,是最大的安慰,我知足了。”画像会成为她最高贵的女友之一,画像在她眼里会是异常重大的事件,在教堂里做忏悔时也一定不会忘记提及。“伟大的神父,请不要怪罪我的虚荣。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女儿给我画的画让我欣喜若狂……”

然而我是绝不可能给她画肖像的,在任何事情上我都能屈从,妥协,在绘画上不行。这不是源于傲慢或者我不善解人意,心地不好。我只是担心,画她的肖像会毁了我,我会无从掩饰自己的内心。研究她的脸,让过去了的一切往事重现,对我是危险的:如果我画了她,她从画里一眼就能看出我对她的真实感受……老妈,可

怜的人,在不伤及自己自负脸面的前提下,她对任何事情都要做一番解释,自圆其说。每次她到我房间里来,看到刚动笔或者已经完成的画,总会说:“画人物你好像不太在行,是吧?画风景似乎好一些。说实话,西尔薇,你这些画谁会买啊……”我对她的结论表现出赞同:“你知道,在绘画里,画肖像是最难的。画风景画时作者可以置身其中,而画人体模特时,画家必须深入对方的内心……”在给她画肖像的问题上,我明确表白了自己的爱莫能助,最后她这样解嘲说:“你很难过是吧。怎么说呢,你已经老了,没学会的本事是再也学不会喽。”

她坐在医院走廊里的白色长椅上,头上戴着一顶过时的贝雷帽,连额头都罩住了,笨重的长大衣,狐皮领子的毛已经稀稀拉拉。那个边角已磨秃的皮拎包里,每次都给我们装着好吃的,这次是一瓶水果罐头。她很快把瓶子熟练地启开,从包里掏出勺子,在椅子上摊开小桌布。当她看见我望着浸泡在浓稠甜汁中的半月形的杏黄色果肉流露出贪婪的眼神时,她马上喜形于色,并不掩饰自己的表情:“这是蜜桃罐头。”她没有忘记提醒我,她带来的蜜桃是所有水果罐头里最昂贵的。好像是心有灵犀似的,恰巧在此刻,对面的门里走出一位证人来,她求之不得的观众。那是个小个子的瘸腿女人,穿着浅蓝色工作服,是我们这一层的清洁女工。“我给女儿买了蜜桃罐头,”老妈大声宣布,她的声音如此之大,那女人不得不转过身来,“她病了。”老妈指指我,“即便她不生病,我也舍得在她身上花钱,花得一分不剩,宁愿自己不吃不喝。”

在观众的角色里,老妈最受欢迎陌生人,那些第一次谋面、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她最喜欢从头给人讲起,很擅长一下子紧紧抓住观众的心,一旦把他们最初的那份好奇心勾起来,她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我们最隐秘的东西在陌生人面前毫无保留地摊